周作人对乡贤著作的发掘与利用

冯仰操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提要：周作人搜集与整理了大量的乡贤著作，并将之作为创造新文学和建构文学史的重要资源：一方面，乡贤著作为散文创作提供了广泛的借鉴与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乡贤及其著作不断为文学史建构提供了关键的坐标与有力的例证。

关键词：乡贤著作；散文；文学史。

周作人的许多工作都与乡土或地方有关，其中之一是对乡贤著作的搜集、发掘与利用。他自言其同乡“只是山阴会稽两县，清末合并称作绍兴县”，[1]1还有大同乡，即山会之余的绍兴府属各县，其心目中的乡贤及乡贤著作正是以绍兴一地为核心。乡贤著作是一地方最显著的文献传承，周作人热衷于乡贤著作，不仅是单纯的搜集与整理，即不止于继承，而且是有意识地发掘和利用，即赋予新的价值和谱系。故本文试图理清以下问题：一，周作人搜集乡贤著作的概况与原因；二，周作人散文实践对乡贤著作的借鉴与征引；三，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对乡贤、乡贤著作的发掘与利用。

一

早在少年时期，周作人便搜集乡贤著作，“在杭州时才十三四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2]1944年，他梳理“杂学”时指出搜书看书的准则共有八类，其一是“乡贤著作”，不仅如此，其他类型中多含乡贤著作，如文化史料类列张岱《陶庵梦忆》，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列陆游《入蜀记》。[3]自清末以来，周作人始终保持着对乡贤著作的热忱，并且形成了独立的趣味和标准。单就其所集乡贤著作的时空范围而言，空间上广及绍兴、浙东乃至浙江，但核心却是山阴、会稽，时间上远及汉宋，但重心却是晚明和清代。

绍兴一地，含山阴、会稽、余姚、上虞、嵊县、诸暨、萧山、新昌八县，秦时属会稽郡，唐时属越州，至南宋方属绍兴府。周作人一生常常谈论上虞王充，余姚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诸暨陈洪绶，萧山毛奇龄等先贤，但搜集乡贤著作是以山阴、会稽两地为重心。这一做法自民初开始，周作人“在绍兴城内做中学教师，忽发乡曲之见，想搜集一点越人著作，这且以山阴会稽为限”，[4]1940年因“愿大而力薄”，依旧“以同在府城的山阴会稽为限”。[5]454

绍兴自古以来名人辈出，积累了大量的文献，以明清为最。周作人一生推崇晚明，但所搜文献以清代最多，如其所言：“宋明的如有自然也收，但如陆放翁，王龙溪，徐文长，陶石匮石梁，王季重，张宗子诸大家而外，有些小诗文集便很难访求了，所得遂以清代为多”。[6]1923年，开始“竭力收罗清朝越中文人的著作”，[7]551934年，“所搜的书清朝的别集一部分一总只有百五十部”，[8]387此后十年规模更大，至1943年，“得清朝人所著书才三百五十部”。[9]

除搜集外，周作人还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包括乡贤生平事迹、文献的真伪、版本及流传等。继民初《读书杂录》的系列文章后，大概自1934年开始，周作人又开始大量写作介绍与整理乡贤著作的专门文章，如《文饭小品》、《洗斋病学草》（1934）、《三部乡土诗》、《关于王谑庵》、《关于童二树》、《关于邵无恙》、《林阜间集》（1936）、《老学庵笔记》、《关于陶筠厂》（1937）、《关于杨大瓢》、《关于朱舜水》（1940）、《李越缦家书》、《三不朽图赞》、《萝庵游赏小志》、《越妓百咏》（1943）、《杨大瓢日记》、《寄龛四志》（1944）等。

周作人热衷于搜集与整理乡贤著作，除了其常说的“乡曲之见”外，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其受到浙江一地文化氛围的影响。明清时期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蔚然成风，江浙一带尤为盛行。清末民初的新式文人依旧被这一氛围所影响，如清末的国粹派、南社均沿袭此风，柳亚子堪为典型：“自束发受书，即有志里中文献”。[10]单就绍兴而言，民初，刘大白在“当初《禹域新闻》附刊《章实斋文集》《李越缦日记抄》之类，随后订为《禹域丛书》。”[7]55鲁迅则辑录校勘《会稽郡故书杂集》。周作人身处其中，不仅爱读刘大白刊登的文字，而且帮助鲁迅征求地方史志文献，“欲得《嘉泰会稽志》及《续志》一部、《会稽掇英总集》一部、《越中金石志》一部以供参考。”[11]

此外，周作人的工作还受到《绍兴教育杂志》（1914年）、《之江日报》（1914年）、《越风》（1935年）等地方性报刊的推动。1915年至1916年，周作人在《绍兴教育杂志》上发表《读书杂录》二十二则，涉及绍兴一地人物、著述、金石等，称之“于越中文献当至有裨益”[12]、“诚足为吾越之光矣”[13]等。1923年，周作人为杭州《之江日报》十周年作《地方与文艺》，梳理近三百年浙江文艺的两种潮流。1936年，周作人接受《越风》的约稿，在其上重新发表《越中文献杂录》（系《读书杂录》的节选），另作《关于童二树》、《关于邵无恙》、《关于陶筠厂》等文。

二

周作人多方面的发掘与利用了其搜集的乡贤著作，如思想史层面，推崇王充疾虚妄的精神，将其列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14]民俗学方面，推崇范寅的《越谚》等，称“不但是歌谣研究的好资料，而且又是方言语法的好例”。[15]本文仅考察周作人在文学方面对乡贤著作的发掘与利用，又分散文实践与文学史建构两方面。

周作人作为现代散文的奠基者，以抒情小品与文抄公体著称。乡贤著作不仅提供了一种作文的典范，而且成为其古今中外引文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周作人偏爱记述民俗的风土志，许多乡贤著作正是理想的风土志，而且“重在怀旧而非知新”。[16]早在民初时，周作人便推崇张岱《陶庵梦忆》，“杂记江南风物，越中故实不及三之一焉，然以文言道俗情，并冰爽绝伦，如握冰雪。读《龙山放灯》《越俗扫墓》诸篇，每为神往，想见明季奢华之状，令人感慨系之。”[17]当其开始写作抒情小品时，也偏爱创作有关故乡风土的怀旧文字，而且常常征引乡贤著作。

如《娱园》（1923年），是以绍兴城外的娱园为对象的忆旧之作。全文追念昔日的娱园，先记述园的由来与昔日风采，征引的材料均为清末的乡贤著作，引《娱园记》以“想见当时‘秋夜联吟’的风趣”，引《娱园诗存》以“想见它的幽雅”，其后转入作者儿时的记忆，重点记叙了对一女孩的隐约的情意，而如今“她早已出嫁，而且抱着痼疾，已经与死当面立着了”。全文充满了伤逝的情调，无论古人的风雅与自己的恋爱，均与园子的荒废一样逝去，但“它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为我心中的火焰的余光所映照着”。[18]《故乡的野菜》（1924年）亦是典型，记述故乡的荠菜、黄花麦果、草紫等数种野菜，征引地方歌谣、风土志、日本《俳句大辞典》等多种文献，不同时空的信息交融一处，大大扩充了散文的内涵。有关风土志的材料，甚至有《清嘉录》等吴地文献，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吴越两地风土大致相同，在周作人眼中，《清嘉录》“记的原是吴俗，而在我读了简直觉得即是故乡的事情了”。[19]

1930年代，周作人做起“文抄公”后更是直接以乡贤著作为对象，抄录其中思想与文章俱佳的段落，尤其是有关风土民俗的文字。如《洗斋病学草》，周作人称“今独于乡土著述中之事与景能随喜赏识者，盖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亲历，故感觉甚亲切也”，并且大段摘引个中诗文，全为“关于社会生活自然名物的事”。全文依次抄录关于香奁、花爆、腊月旧俗、歌谣等，并引《越谚》、《武林旧事》、《江乡节物词》等其他相关文献加以佐证或补充。[8]387-392

又如会稽孙德祖《寄龛四志》，周作人虽然评价不高，却指出其“有一特色，即附带说及的民俗资料颇不少，普通文人著作一心在于载道翼教，孙君却时时谈及绍兴民间的风俗名物，虽多极简略，亦是难得而可贵也”，其下抄录该书，“一是关系鬼事的，二是关于俗语的”。[20]

再如《三部乡土诗》，依次谈及《娱园诗存》、《鞍村杂咏》、《墟中十八图咏》等三部乡贤诗集。其中大量的引文皆与故乡风景名胜有关，如《娱园诗存》，“读集中潭水山房微云楼诸咏，每记起三十年前梦影，恍惚如在目前”，又谈《墟中十八图咏》，摘戴南山序：“余披其图，泉石之美秀，峰岭之峻拔，园林之幽胜，亭馆之参差，云树之缥缈，鱼鸟之飞跃，以及桑麻果蔬，牛羊鸡犬，藩篱村落，场圃帆樯，莫不历历在目，而恍若身游其中”，正是其夫子自道。[1]1-4

此外，周作人1940年代写作的《桑下丛谈》多以乡贤著作为对象，聚焦的更是故乡的风土人情。《桑下丛谈》收录42则，全为数百字的笔记小品，从题目上看，基本为故乡人物、风景、习俗。篇幅虽少，却更见周作人对材料的运用之妙，他往往摘引一段材料作为引子，紧随的是个人的经验或独到的议论，并非一铺到底而是纡徐有致。如《芡与莲》介绍故乡的两种植物，更着眼于古今风俗的变化，先引《嘉泰会稽志》中“芡”的介绍，古人有吃藕梗的习俗，作者案今绍兴不再吃，并记述儿时吃菱蓬的经历；又引“荷”的介绍，古人多种莲花，但“此景今已无有”。[21]

三

周作人不仅借鉴与征引乡贤著作，而且在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观时将自己熟悉的乡贤作为最重要的文学史坐标，为当下新文学尤其是现代散文提供一种理想的传统资源。自1920年代至30年代，周作人多次建构新的文学史谱系，代表文章有《地方与文艺》（1923）、《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再谈俳文》（1937）等，其中关键的坐标均是乡贤及其著作。

周作人作为新文学的奠基者，为了论证新文学的正当性，并且提供有效的文学资源，将视线投向古今中外，中国的传统文学亦在其中。传统文学有正统和偏门，有主流和支流，周作人所在意的是向来被正统、主流所压抑的偏门、支流，于是发现了晚明和越中，找到了张岱、王思任等晚明乡贤，如其所言：“这思想与文艺的旁门互相溷合便成为晚明文坛的一种空气，自李卓吾以至金圣叹，以及桐城派所骂的吴越间遗老，虽然面貌不尽相似，走的却是同样路道。那么晚明的这些作品也正是很重要的文献，不过都是旁门的而非正统的，但我的偏见以为思想与文艺上的旁门往往比正统更有意思，因为更有勇气与生命”。[22]周作人的乡贤正是“非正统”“吴越间遗老”的代表，在不同时期成为其建构的理想文学的例证。如陈文辉所言“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周作人所关注的视角转移，越中乡贤展示出不同的身份、形象与面目”，[23]周作人不断定位乡贤及其著作，由国民文学的代表到新文学的源头再到新俳文的代表，由公安竟陵 “两派结合后的大成绩”到两派“混合的一种新文章”。

1923年，周作人试图将地方文学作为理想的国民文学的典型。这种新的国民文学应该是“有人类共同的性情而又完具民族与地方性的国民生活的表现”，[24]而浙江地方的文艺正是具有“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的文学。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最早提及乡贤文学：

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在明末时这种情形很是显露，虽然据古文家看来这时候文风正是不振，但在我们觉得这在文学进化上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那些文人多无意的向着现代语这方向进行，只是不幸被清代的古学潮流压倒了。浙江的文人略早一点如徐文长，随后有王季重张宗子都是做那飘逸一派的诗文的人物；王张的短文承了语录的流，由学术转到文艺里去，要是不被间断，可以造成近体散文的开始了。毛西河的批评正是深刻一派的代表。

其中，无论飘逸还是深刻，所举代表人物均属绍兴乡贤。无论飘逸还是深刻，两派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不是什么派的道学家或古文家，较少因袭的束缚，便能多少保全他的个性”。推崇乡贤文学的个性，实则为了批评新文学，认为现在的思想文艺界有普遍的约束，“一定的新的人生观与文体，要是因袭下去，便将成为新道学与新古文的流派”，最终制约新文学的发展。[2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将作为飘逸一派代表的徐文长、王思任、张岱推崇为“近体散文的开始”，显示了其后建构新文学源流的理论原点。

之后，周作人继续发掘传统文学，为新文学尤其是现代散文提供历史的支点，而乡贤及其著作继续成为理想的资源。1926年，周作人致信俞平伯，断言：“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26]并且提议编一本文选，“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再次提及晚明乡贤：

王季重文殊有趣，唯尚有徐文长所说的以古字奇字替代俗字的地方，不及张宗子的自然。张宗子的《琅嬛文集》中记泰山及普陀之游的两篇文章比《文饭小品》各篇为佳，此书已借给颉刚，如要看可以转向他去借。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

徐文长、王思任、张岱作为明末文学的代表，成为文学史坐标的中心，上连宋代苏轼等人，下接清代以及“五四”一代文人。到1928年，周作人还提及文学史地位更高一筹的晚明公安派，认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成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杆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27]到1932年，周作人将这一系列思索付诸公开的演讲，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此文以文人文学尤其是古文为对象，将文学史的变迁看成言志与载道两种潮流的交替，将公安派为代表的言志派视为新文学最近的源头。所推举的言志派，主要指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有清一代的余波，如李渔、袁枚等人，以之与载道派的韩愈、桐城派对立。其中，周作人将晚明乡贤与公安竟陵两派联系，视为两派的集大成者，从而成为新文学的源头：

后来公安竟陵两派文学融合起来，产生了清初张岱（宗子）诸人的作品，其中如《琅嬛文集》等，都非常奇妙。《琅嬛文集》现不易买到，可买到的有《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两书，里边有些很好的文章。这也可以说是两派结合后的大成绩。[28]

与公安竟陵均有流弊相比，周作人对两派融合的张岱等人的褒扬显而易见。此外，还称赞清末的俞樾，认为他“是以一个汉学家而走向公安派竟陵派的路子”。[29]但是，周作人此时关注的只是为现代散文寻找历史的源头，张岱等人只是公安竟陵等性灵文学的附庸。

周作人并未停止对张岱等人的发掘，几年后，在《谈俳文》、《再谈俳文》中提倡以张岱为代表的新俳文体系，是一次更具个性化的文学史建构。其中，张岱、王思任以及清代的汉学家俞樾等乡贤不再依附于公安、竟陵两派，成为新体系的中心。周作人对乡贤及其著作的关注，从此前不免宏大的历史谱系转向具体的文章风范，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树立一种风趣的文章典范。

周作人讨论日本和中国传统的俳谐文，是为了推崇一种新的文章风格。周作人推崇日本的俳文“多用巧妙的譬喻适切的典故，精练的笔致与含蓄的词句，又复自由驱使雅俗和汉语，于杂糅中见调和”，[30]在中国古代则找到了张岱等人代表的新俳文，表现是“他的目的是些正经文章，但是结果很有点俳谐，你当他作俳谐文去看，然而内容还是正经的，而且又夹着悲哀”。[31]这种新的文章风格后来被提炼为“风趣”，周作人后来总结：“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32]

除了张岱等人外，周作人还在其他乡贤及其著作那里看到了“风趣”。如评论朱舜水，“想见舜水之风趣，欲使异邦学子领取此谐味固亦甚难，则其寂寞之情亦可想也。”[5]458又评论俞樾，“轻妙与庄重相和，有滑稽之趣，能令卷中玄怪之空气忽见变易，有如清风一缕之入室，看似寻常，却是甚不易到也。”[33]

整体来看，周作人与乡贤著作之间构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一方面，乡贤著作为周作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和启迪，另一方面，周作人常常将自己的价值判断投射到乡贤著作上，赋予其一种新的意义和生命。正是在这种古今的良性互动中，周作人继承并且彰显了地方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 周作人.三部乡土诗.周作人散文全集.7[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周作人.〈燕都风土丛书〉序.周作人散文全集.8[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7.

[3] 周作人.小说与读书.周作人散文全集[M]. 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93.

[4] 周作人.文饭小品.周作人散文全集.6[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59.

[5] 周作人.关于朱舜水.周作人散文全集.8[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 周作人.〈虎口日记〉及其他.周作人散文全集.9[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

[7] 周作人.旧梦.周作人散文全集.3[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 周作人.洗斋病学草.周作人散文全集.6[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 周作人.〈桑下丛谈〉小引.周作人散文全集.8.2009.730.

[10] 柳亚子.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磨剑室文录（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13.

[11] 周作人.征求故书.周作人散文全集.1[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0.

[12] 周作人.会稽风俗赋.周作人散文全集.1[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00.

[13] 周作人.跳山建初买山石刻.周作人散文全集.1[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09.

[14] 周作人.古典文学.周作人散文全集.9[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95.

[15] 周作人.〈越谚〉跋.周作人散文全集.6[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5.

[16] 周作人.风土志.周作人散文全集.9[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09.

[17] 周作人.越中游览记录.周作人散文全集.1[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35.

[18] 周作人.娱园.周作人散文全集.3[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5-107.

[19] 周作人.清嘉录.周作人散文全集.6[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8-249.

[20] 周作人.寄龛四志.周作人散文全集.9[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13.

[21] 周作人.芡与莲.周作人散文全集.8[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56.

[22] 周作人.〈梅花草堂笔谈〉等.周作人散文全集.7[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6.

[23] 陈文辉.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周作人的道路[D]，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142.

[24] 周作人.读〈草堂〉.周作人散文全集.3[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

[25]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周作人散文全集.3.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2.

[26] 周作人.与俞平伯书二通.周作人散文全集.4[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22.

[27] 周作人.〈燕知草〉跋.周作人散文全集.5[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19.

[28] 周作人.中国文学的变迁.周作人散文全集.6[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1.

[29] 周作人.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周作人散文全集.6[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1.

[30] 周作人.谈俳文.周作人散文全集.7[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70.

[31] 周作人.再谈俳文.周作人散文全集.7[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83.

[32] 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周作人散文全集.8[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58.

[33] 周作人.右台仙馆笔记.周作人散文全集.8[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50.

The discover and use on follow villager works of Zhou Zuoren

Feng Yangcao

Abstract: Zhou Zuoren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a lot of follow villager works, and took it as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of the creation of new liter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follow villager works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reference and abundant materials for prose creation; on the other hand, follow villager and their works provide the key coordinates and powerful exampl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Follow villager works; Prose; Literary history.

作者简介

冯仰操，男， 1985年7月，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通讯地址：江苏徐州泉山区大学路一号 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文法学院221116。